

记录西藏：二十世纪上半期英国人在西藏的摄影活动^{*}

赵光锐 张植荣

内容摘要：二十世纪上半期英国人在用影像记录西藏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西方人通过摄影获得的西藏直观印象完全操控在英国人尤其是英印殖民地边境官员手中。摄影既是入藏的英印殖民地官员的一种文化艺术活动和社会交往途径，也是获取西藏情报的重要手段，还是塑造有利于英国利益的西藏形象的有效视觉载体。英国人在西藏的“外交摄影”隐含着所希望表达的英国、印度殖民地政府与中国西藏之间的权力关系模式，反映了英国代表们与西藏精英人物保持着经常和良好的接触。相关图像也可以呈现西藏在文化人类学上的“与众不同”，甚至被用作西藏所谓“独立地位”的视觉证据。英国的早期西藏摄影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被不同的社会群体不断再选择、再阐释，有些被刻意突显，有些则被故意遗忘。对这些历史摄影进行细致的历史学、视觉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揭示其特定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以及被当代西方赋予的新美学内涵，有利于我们更好使用和解读它们。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二十世纪美国的西藏知识生产与涉藏话语体系研究”（20BGJ05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受到全国侨联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2019-2023年度项目“海外藏胞的跨境迁移与身份认同”（19BZQK257）资助。

英国学者理查德兹 (Thomas Richards) 在《帝国的档案馆：知识与帝国的幻想》一书中提出，英帝国在其鼎盛时期曾经自信地认为，可以收集、掌握、归纳、分类和保存关于任何有明确地理范围的某一区域的总体知识，可以围绕该知识对象建立一个“档案国家”¹。中国西藏就是曾经被英国长期倾注心血和资源试图形成“总体知识”的地区，英国在一个半多世纪的涉藏过程中建立起一个有关西藏知识的“西藏档案库”。其中的资料不单纯指有关西藏地理、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历史档案，也包括专业性著作、私人报告、游记、小说、新闻报道、艺术藏品等，还有数量庞大的照片、电影、绘画、地图等视觉资料。从二十世纪初到 1947 年的近半个世纪中，英国人在用影像记录西藏、塑造西藏形象方面有着绝对的优势，西方人从摄影上获得的西藏直观印象完全操控在英国人尤其是英印殖民地边境官员手中。英国人在自身社会 - 文化的审美趣味的驱使下，在外交利益的主导下进行有利于殖民利益的“记录西藏”活动。英国人的西藏摄影不是单纯的写实记录，而是一种对拍摄对象的再创造、再阐释，用以塑造一个英国殖民者所希望看到的西藏形象。另外，他们在某个时段的记录，也受到当地价值观、审美观的影响，而做出了一些改变。作为英帝国“西藏档案库”中的精华，西藏摄影在西方人了解中国西藏的过程中发挥着持续的影响力，构成了他们认识和想象西藏的“历史底版”，不断被现实冲刷出新的照片。影像拍摄和传播是近代英国侵藏过程中进行的西藏知识生产活动的极其重要的内容之一²。本文在梳理英国人 1950 年以前在西藏的摄影活动和具体历史背景基础上，分析拍摄者与被拍摄者间的互动和双方复杂的政治 - 文化关系，重点揭示英印负责西藏事务的殖民地官员们进行西藏摄影的真实意图以及他们赋予西藏摄影的政治、文化隐喻。

一、二十世纪上半期英国人在西藏的主要摄影活动

在照相技术出现之前，西方探险者、传教士等主要通过游记、报告等文字形式向公众描绘西藏，有时也伴有一些简图、油画和地图等视觉形式。例如，1661 年奥地利传教士格吕贝尔 (Johannes Grueber，中文名白乃心) 和他的教友从北京返回欧洲时经过了拉萨并停留了一个月，是最早进入拉萨的欧洲人。他的报告于 1667 年以拉丁文在阿姆

1 Thomas Richards, *The Imperial Archive: Knowledge and the Fantasy of Empire*, London: Verso, 1993: 6.

2 关于近代英国侵藏过程中的西藏知识生产活动，参见赵光锐：《论二十世纪上半期英帝国的西藏知识生产机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1 (4)：166-176；赵光锐：《皇家地理学会与近代英帝国的西藏知识生产》，《史林》2020 (4)：206-218。

斯特丹出版，书中配有一幅布达拉宫的插图，虽然与当时的布达拉宫差距甚远，但在此后两百多年内一直是西方人有关布达拉宫的唯一视觉形象。书中还有众多涉及西藏人生活、宗教活动、妇女、儿童等的插图，但是人物形象与真正的西藏人有天壤之别，衣着打扮、面部特征要么类似阿拉伯人，要么纯粹就是欧洲人³。这些插图并非出自格吕贝尔之手，是画师根据文字描述想象创作出来的。对于当时从未见过西藏人、又没有照片可供参考的一个欧洲画师，要画出西藏人只能依靠丰富的想象。

1839年法国人达盖尔发明了照相机，与这一技术发明相伴而生的摄影逐渐演变为一种流行的文化艺术活动，后来又成为一种专业性的知识生产方式。十九世纪后半期，摄影被大规模地运用于欧洲的海外地理探险和人类学考察，成为研究、记录、表述非西方的自然景观、文化和社会形象的重要手段。欧洲人类学家通过照相机、摄影机拍摄非洲人、印第安人或南美丛林里的原始人，不仅是为“捕捉那些与欧洲白人在外表和习惯上完全不同的人的形象，而且他们认为影像能为观众提供一种纯粹的、直接进入‘现实’(reality)的手段”⁴。旅行游记和探险报告的激动人心的文字描述配合让人陶醉的摄影、异国情调的油画等视觉材料，可以更为直观形象地在本土再现遥远地域的景象。因此，欧洲人对异域的审美标准和文化想象很大程度上就源于对这些影像中介的观察和欣赏⁵。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加尔各答的印度博物馆就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人类学研究项目，对印度次大陆的人口按照种族、宗教、种性和职业等进行人种学分类和研究，人类学摄影在其中占据了主导性地位。最后的成果是八卷本的《印度的人口》(*People of India*)，第一卷有对喜马拉雅山区的人口如西藏人、不丹人、锡金人的人类学描述，同时刊出了几张人类学照片帮助读者辨别其人种学特征。但是这些照片都是在摄影棚中利用长期生活在印度的一些西藏、尼泊尔等商人拍摄的，并不是实地摄影。

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法国的奥尔良亲王(Prince Henri D'Orleans) 1889-1890年在西藏北部羌塘草原和东部拍摄的照片是欧洲人最早的西藏实地摄影，有些在其1891年的游记中公开。不过，按照近来英国视觉人类学专家哈里斯(Clare Harris)教授的研究，1863年一位名叫菲利普·埃格顿(Philip Egerton)的英国士兵秘密进入了西藏最西端几十公里的地方，拍摄了河流冲刷出的一座岩石桥(rock bridge)的照片，她认为这

3 本文使用的是该书1985年的德文版，参见Johannes Grueber, *Als Kundschafter des Papstes nach China: 1656-1664; d. Erste Durchquerung Tibets*. Hg. Franz Braumann. Stuttgart: Thienemann, 1985.

4 Assenka Oksiloff, *Picturing the Primitive: Visual Culture, Ethnography, and Early German Cinema*, New York: Palgrave, 2001: 8.

5 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3: 130.

是在西藏的第一张摄影⁶。1900-1901年，俄国人诺祖诺夫（Ovshe Norzunov）和崔比可夫（Gombojab Tsybikov）在西藏拍摄了50多张照片，涉及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等寺院以及纳木措等，也是较早的西藏实地摄影之一，崔比科夫1900年拍摄的布达拉宫等的照片则是最早的拉萨摄影。俄国人赠送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一整套这些照片，引起学会会员们的巨大兴趣⁷。但是当亚洲的很多地区都已被西方人通过摄影详细记录和展现时，西藏总体上仍然是一片未被照相机触及的“视觉上的空白点”。绝大部分欧洲的探险者、旅行家和英印殖民的官员们只能在西藏的周边地区，尤其是英国殖民势力已经触及的拉达克、锡金、不丹、尼泊尔等地进行拍摄。当时的欧洲和印度的有闲阶层对于喜马拉雅的异域风情在视觉上的消费兴趣逐渐增强，喜马拉雅风景和人物的摄影、明信片等受到欢迎。有英国人在大吉岭、加尔各答专门建立了以喜马拉雅风情为主题的照相馆，最有名的是约翰斯顿与霍夫曼照相馆（Johnston and Hoffmann Studio），他们雇佣一些在当地生活的喜马拉雅土著居民在摄影棚中进行各种人类学、民俗学摄影，一部分作品被用于明信片、报纸或杂志，也有不少出现于学术著作中，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印度测绘局最知名的土著间谍之一达斯（Sarat Chandra Das）在1869年和1872年入藏期间都携带了照相机，他虽然可能是最早在西藏核心地区进行实地摄影的人，奇怪的是却没有照片留下来，皇家地理学会目前保存的标注为达斯的照片实际上都不是在西藏拍摄的。美国藏学家柔克义（W. Woodville Rockhill）1892年编辑出版了达斯的《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Journey to Lhasa and Central Tibet*），所配四十多幅照片来自于约翰斯顿与霍夫曼照相馆的室内摄影或是在尼泊尔的寺庙中拍摄的。按照当时欧洲已经普遍流行的阅读习惯和人类学理论，游记的文字表述必须应该有相应的视觉证据，为了符合这种要求，柔克义和达斯不得不大量使用这些虚假的西藏摄影⁸。英国藏学家瓦德尔（Laurence Austine Waddell）也较早利用摄影对西藏人进行人类学的类型学记录和研究，但是他在1903年之前并没有真正进入西藏，只是游荡在喜马拉雅的拉达克、锡金、噶伦堡、大吉岭等地方，他1895年出版的《西藏的佛教，或喇嘛教》的插图大部分也是

6 Clare Harris, *Photography and Tibet*, London: Reaction Books, 2016: 16.

7 Clements R. Markham, "Address to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1904."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24, 1904: 6. 关于两位俄国旅行者西藏摄影的深入研究，参见 Alexandre, *Tibet: In the Earliest Photographs by Russian Travelers 1900-1901*, New Delhi: Studio Orientalia, 2013.

8 Clare Harris, *The Museum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Art, Politics,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Tibe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98-103.

来自大吉岭的照相馆⁹。

自二十世纪初开始，获得有关西藏本身的真实景象而不是在摄影棚中拍摄虚假的西藏照片，日益成为那些装备了相机的西方旅行者的优先性工作。随着1904年以后进入西藏的西方人尤其是英国人越来越多，西藏摄影成为记录行程、向公众展示旅行成果的重要手段，“旅行摄影”的重要目的是作为视觉证据向西方人展现旅行者是克服重重困难、成功进入“封闭的西藏”的第一个欧洲人、第一个进入拉萨的白人女性、第一个造访西藏的美国人等等¹⁰。一旦获得成功，他们的摄影就会被印刷在大范围流通的报纸上，在博物馆展出或者在作旅行报告时展示给听众。这也使高质量的插图、照片是西藏游记、新闻报道和展览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公众对西藏的视觉消费需求也大幅增加。在两方面相互作用下，西方的西藏摄影的数量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总体而言，英国人是二十世纪上半期西藏影像作品的主要生产者，而英印驻锡金的政务官等负责西藏事务的骨干官员又是核心的摄影群体。这些人物包括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怀特（John Claude White）、贝利（F. M. Bailey）、查理斯·贝尔（Charles Bell）、威尔（Leslie Weir）、威廉逊（Frederick Williamson）、古德（Basil Gould）、黎吉生（Hugh Richardson）等。英国人有进入西藏的便利条件和机会，负责西藏事务的官员极其看重影像记录的作用，摄影构成他们入藏活动的重要内容，不时入藏的“英国使团”还会专门安排随行的摄影师并配备专业化的设备，包括最先进的照相机、电影摄影机以及幻灯机、电影放映机等。

1903-1904年荣赫鹏侵略军进入拉萨，这也是西方第一次大规模用现代影像手段记录和展现西藏的活动。在筹划侵略行动时，英国人就已经准备好用影像手段记录侵略军的活动，以向本国公众展现“真实的西藏”和取得的政治、军事上的成功。随军的怀特（John Claude White）是官方摄影师，负责记录整个“使团”的活动。他的主要装备是一部笨重的13×10英寸方箱照相机，在藏期间他吃力地拖拽着这架照相机捕捉拍摄英国侵略军的活动¹¹。其他人则主要携带1897年发明的柯达折叠口袋式相机，一些军官还配备了这款相机在1900年发展出的第三代产品。便携小型照相机可以不受环境限

9 参见 Laurence Austine Waddell, *The Buddhism of Tibet, or Lamaism: with its Mystic Cults, Symbolism and Mythology, and in Its Relation to Indian Buddhism*, London: W.H. Allen, 1895.

10 Clare Harris, *Photography and Tibet*, 2016: 54.

11 怀特是用摄影记录西藏的重要人物，对其喜马拉雅摄影的研究，参见 Pamela Deuel Meyer and Kurt Meyer, *In the Shadow of the Himalayas: Tibet, Bhutan, Nepal, Sikkim: A Photographic Record by John Claude White, 1883-1908*, Ahmedabad: Mapin, 2005.

制，随时随地进行拍摄。怀特和瓦德尔拍摄了几百张黑白照片，贝利拍摄的照片则多达八百七十张¹²。他们拍摄的胶卷被快速送回加尔各答、大吉岭、噶伦堡等地冲洗，之后发回英国国内，英国的报纸、杂志很快就刊出了这些照片，有的杂志甚至在当时就被邮寄给了还在西藏的英国军官，有些则被印刷成了明信片。也有很多黑白照片在随军军官、记者后来的游记、报告中被披露，例如兰道（Perceval Landon）的《拉萨》（*Lhasa*）、坎德勒的《拉萨真面目》、瓦德尔的《拉萨及其神秘》（*Lhasa and Its Mysteries*）等。尤其是瓦德尔的游记公布了大量摄影，包括三张彩色照片和一百一十张黑白照片，还有不少绘画、地图和图表。随军的地理学家海顿驻扎在岗巴宗时拍摄了不少山脉、山峰和谷地的照片，印度总督寇松（George N. Curzon）将一部分送给了皇家地理学会。学会的弗莱士费尔德（Douglas W. Freshfield）依据这些照片详细研究了西藏南部的地理学特征¹³。荣赫鹏 1905 年在皇家地理学会做报告时展示了自己拍摄的八张效果良好的西藏照片，包括羊卓雍湖（ཡར་འབྲོག་གཡུ་མཚོ་）、布达拉宫的风光和四位噶伦（བཀའ་ཞུགས་）的合影等，后来刊登在《地理学杂志》上¹⁴。

贝利后来在 1905-1909 年作为驻江孜商务代表、1921-1928 年担任驻锡金政务官期间继续进行摄影活动，他在江孜和拉萨期间拍摄的录像包括了寺庙羌姆表演、农民收割、纺织、牦牛商队等内容，保存下来的约有二千张照片。被誉为英国西藏政策的设计者和英印殖民系统内部的西藏权威的查理斯·贝尔也有伴随其外交活动而产生的大量西藏摄影，“他的日记和笔记显示，他清晰地意识到需要保存视觉的记录，他把它们看作进行研究、写作以及增进英国公众的西藏兴趣的重要方式。”¹⁵ 他于 1920 年在拉萨停留的近一年时间内拍摄的照片构成了贝尔西藏摄影的绝大部分。1924 年他通过《地理学杂志》首次向公众展示了在拉萨和拉萨周边拍摄的照片，内容涉及拉萨人郊游聚会的场景、功德林寺（ཀུན་བདེ་སྤྱིང་）全景、桑顶寺（བསམ་ལྷིང་སྡེ་ཁོན་）远景等。贝尔还曾到拉萨以北的热振寺（ར་སྤྱིང་སྡེ་ཁོན་）参观，他公布了绘制的从拉萨到热振寺之间的地理草图，这是西方人第一次比较清楚地掌握从拉萨向北到热振寺之间的地理、交通情况¹⁶。1924 年出版的《西藏今昔》一书展示了更多在拉萨期间的照片¹⁷。贝尔的很多照片都是由他的锡

12 Bailey Collection: Tibet 1903-4. F. M. B. [volume] I-III, photo 1083/12, British Library.

13 参见 Douglas W. Freshfield, "Tibet. I. Notes from Tibet."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3, 1904: 361-336.

14 参见 Frank Younghusband, "The Geographical Results of the Tibet Mission."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5, 1905: 481-493.

15 Clare Harris, *Photography and Tibet*, 2016: 71.

16 参见 Charles Bell, "A Year in Lhasa."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2, 1924: 89-101.

17 Charles Bell, *Tibet: Past and Present*, New Dehl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 1990.

金助手饶登（རབ་བསྟན, Rabden）完成的，他为贝尔服务了十八年。一方面贝尔是需要被拍摄的对象，他的各类西藏公务活动需要被记录下来，另一方面是由于西藏人对于照相机的陌生和排斥，需要饶登协调或直接作为拍摄者才能使拍摄顺利进行。因此现在保存的很多贝尔的西藏摄影无法分清到底是他本人还是饶登的作品，一般都标注为“查理斯·贝尔或饶登”。另一位驻锡金政务官威廉逊和他的夫人玛格丽特·威廉逊（Margaret Williamson）在 1930-1935 年间也拍摄了一千七百张喜马拉雅地区（不丹、锡金、西藏等）的摄影。威廉逊还拍摄了二十三盘十六毫米彩色电影胶片，一些记录了他在 1933-1935 年间带领使团进入西藏的活动，包括江孜、日喀则、拉萨等地人们的日常生活、寺庙、风光等，还有当时重要的西藏人物如摄政热振活佛（འཕགས་པ་འཇུག་པོ་ཆེ）、擦绒·达桑占堆（ཅེ་རོང་ཞུ་བཟང་དགུ་འབྲུལ）等的活动记录，都是比较珍贵的影像资料。英印最后一任驻拉萨的代表黎吉生也是位摄影爱好者，他长期生活在拉萨，他的两千多张照片有很多涉及西藏的建筑、纪念物、石刻、铭文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锡金政务官古德及其秘书兼摄影师查普曼（Spencer Chapman）则是最热衷于西藏摄影的人，就摄影的数量和质量而言，他们是英国入藏人员中的佼佼者。1936-1937 年的古德使团在拉萨停留了近半年时间，1937 年查普曼写文章介绍了在西藏尤其是拉萨期间的摄影活动。他记述：

由于我们在拉萨停留了六个多月时间，使我们有独一无二的机会开展摄影工作，尤其是在那里我们作为政府的客人有机会接触到所有阶层的人物，从摄政和噶伦到黑乎乎的西藏牧民——他们与成群的牦牛和羊群无拘无束地游荡在西藏中部的高原上。同样，我们可以参观很多建筑，目睹庆典仪式，这都是欧洲人以前极难看到的。……我们的机会实际上是没有任何限制的。¹⁸

查普曼共计拍摄了二千五百张照片、三千英尺十六毫米电影胶片、六千英尺十六毫米柯达克罗姆胶片、一万三千英尺三十五毫米电影胶片（无声），摄影的数量、质量、涉及的内容以及多样性是极其惊人的。他在 1938 年出版的《圣城拉萨》（*Lhasa: The Holy City*）中公布了部分照片，《地理学杂志》的书评认为，“这些照片尤其是彩色照片

18 Spencer Chapman, "Tibetan Horizon: An Article on Filming in Tibet and Lhasa." *Sight and Sound* 6, 1937: 122.

极其出色，是目前为止最出色的关于拉萨的摄影。”¹⁹ 皇家地理学会在 1938 年邀请查普曼演讲其拉萨的所见所闻，他也向听众展示了西藏照片和录像²⁰。使团的其他成员尼皮恩 (Evan Nepean)、黎吉生、达格 (Sidney Dagg) 等也都是摄影师，在拍摄西藏方面有共同的工作需求和兴趣。1940 年十四世达赖喇嘛举行坐床典礼，古德前往拉萨期间也进行了拍摄，包括当时达赖喇嘛的家庭、摄政热振活佛以及各类官方接待活动等。古德和斯道顿 (Harry Staundon) 参加了坐床典礼第二天的活动，被认为是“仅有的两位见证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举行的坐床典礼的西方人”，他们在花园的一堵墙后安置摄像机，对典礼进行了秘密拍摄²¹。

西藏摄影保存于英国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图书馆以及私人收藏者手中，目前收藏较多的是牛津大学的皮特里弗斯博物馆 (Pitt Rivers Museum)、大英博物馆、英国国家图书馆、皇家地理学会等，这些摄影绝大部分来源于负责西藏事务的骨干官员、印度殖民地服务人员等。皮特里弗斯博物馆收藏有从 1920-1950 年间英国人拍摄的六千张西藏照片，是英国西藏摄影收藏最丰富的博物馆，包括贝尔 (八百张)、查普曼 (六百张)、斯道顿 (二百五十张)、尼皮恩 (五百五十张)、霍普金森 (八百张)、黎吉生 (二千张)、饶登等的摄影²²。该博物馆已将部分摄影制作成数字形式，建立了名为“西藏影集：英国人在西藏中心的摄影 1920-1950”的专业性网站，人们可以非常方便地查阅、欣赏这些摄影²³。大英博物馆所收藏西藏摄影有很大一部分与皮特里弗斯博物馆重合。英国国家图书馆的收藏主要来自江孜商务代表和驻锡金政务官贝利，共计二千多张²⁴。贝尔的一部分摄影和日记也保存在英国国家图书馆，一部分收藏在利物浦国家博物馆。威廉逊的摄影都保存在剑桥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其中一部分摄影、纪录片经过新的数字化编辑，可以在该博物馆网页上查看²⁵。查普曼虽然拍摄了大量的西藏电影片段，但

19 E. H. C. W., "Reviewed Work: *Lhasa: The Holy City* by F. Spencer Chapman."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93, 1939: 260.

20 Henry Balfour, Francis Younghusband, Frederick O'Connor and C. Suydam Cutting, "Lhasa in 1937: Discussion."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91, 1938: 506-507.

21 Clair Harris, "Seeing Lhasa: British Photographic and Filmic Engagement with Tibet 1936-1947." In *Seeing Lhasa: British Depictions of the Tibetan Capital 1936-1947*, eds. Clare Harris and Tsering Shakya, Chicago: Serindia Publications, 2003: 37.

22 关于这些摄影在皮特里弗斯博物馆更为具体的收藏保存情况，可参见 Charles Alfred Bell, "Tibetan Photographic Collections at The Pitt Rivers Museum." 2003: 141-57.

23 "The Tibetan Album — British Photography in Central Tibet 1920-1950." <https://tibet.prm.ox.ac.uk>.

24 Bailey Collection: Synopsis. (Unspecified), photo 1083, British Library.

25 "The Frederick Williamson Collection." <http://www.digitalhimalaya.com/collections/williamson/>

是保存下来的只有一盘十六毫米的电影胶片，它与古德、贝利、贝尔拍摄的一些录像、诺伊尔的《攀登珠穆朗玛峰》和《珠穆朗玛峰史诗》等纪录片，保存在英国电影学会的国家电影和电视档案馆。

这些摄影的时间集中于英国侵藏的高峰时期（1904-1947年）；拍摄地点则主要位于西藏南部和中心地带，呈现了从印度北部翻越喜马拉雅山最终到达拉萨的路线以及沿途的地理学、动植物学和人类学等特征；摄影的主体是英印殖民地负责西藏事务的官员；主要内容涉及当时的西藏精英和上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以及英国人与他们各种正式、非正式的交往活动，记录了英国人在西藏活动的各类历史瞬间。这些摄影折射出英国与中国西藏地区关系的不断变化和英国政府的对藏政策，体现了英国人的西藏印象、描述西藏的方式和审美偏好。

二、外交摄影：英国人进行西藏摄影的政治意图

在二十世纪上半期西方各国为揭开西藏的“神秘面纱”而展开的“摄影竞赛”中，不论从拍摄时间的持续性、影像的数量、内容及其影响而言，英国都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源于在印度的统治权所赋予的英国人在拍摄西藏时的便利。1904年的侵藏战争使英国控制了南部的进藏路线，它始于印度北部的大吉岭、噶伦堡，经甘托克到西藏的亚东（ཨ་ཨ་），再沿春丕谷（ཅུ་ཕེ་ཅུ་）取直线北上江孜，最后到达拉萨。查普曼在1938年的《圣城拉萨》中记叙：“从甘托克到江孜沿途每隔十至十五英里都设有客栈。1904年荣赫鹏远征后不久开始修建客栈。自那时起，大部分的客栈都经过了扩建和重修。它们最初为政治专员所用，后来也接待游客。每年，数量有限的游客获准踏上这条商路直抵江孜。”²⁶在这条道路上，英国官员、士兵、商人、旅行者、探险家等往来不断，既是向西方世界输出西藏商品、信息的主动脉，也是向西藏输入西方商品、文化观念的主渠道。1904-1947年间英印边境骨干官员们控制着这条入藏路线，他们会拒绝非英国人或不符合要求的西方旅行者，自己却有机会进入西藏并停留相当长时间，一些英国人则常驻亚东、江孜和拉萨等地，这赋予他们在拍摄西藏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这让英国负责西藏事务的官员们成为西方人获取西藏信息的主要“中间人”，也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西方有关西藏的知识生产。

摄影一般被认为比文字更能“忠实”地记录观察对象，将生活原貌直接呈现给读

26 斯潘塞·查普曼著，向红笏、凌小菲译：《圣城拉萨》，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11。

者，减少文字表达所不可避免的信息丢失，具有更强的场景存留能力²⁷。但是摄影也具有与文字表述相似的局限性，即同样受作者的主观意图、认知水平、审美倾向等的制约。摄影作品的选取、使用方式和传播对象也会受作者、机构和社会群体的影响。英国人在西藏的摄影非常鲜明地体现出这种局限性。负责西藏事务的官员首先是以帝国边疆的开拓者和保卫者身份观察、拍摄西藏，西藏摄影本质上只是职业活动的副产品，内容、对象和角度的选择、对照片的解释和使用等都受制于其政治身份。摄影表面上是他们在西藏的文化艺术活动和社会交往途径，实际上是获取西藏情报的重要手段，也是塑造有利于英国利益的西藏形象的视觉工具。他们庞杂巨量的西藏摄影背后隐藏着殖民主义的政治动机、美学偏好和大众视觉消费等之间极其复杂的关系。英国普通士兵、低级军官、旅行者、探险家的摄影只是在当时的一些报纸、杂志或明信片上出现，很快就被人们遗忘。只有那些骨干官员的摄影才会通过报告、游记以及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私人机构等的收藏和反复展出，产生长时间大范围的影响。

1903-1904年的英国侵藏战争是一场残酷的军事侵略，一些当事人不仅在文字作品中美化这次行动²⁸，还通过有选择性地公开部分摄影的方式遮蔽历史真相。1904年8月英国侵略军进入拉萨，英国《星球报》(*The Sphere*)刊登了相关照片，与寇松为其西藏政策辩护的演讲放在一起，为其佐证此次行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贝利将照片和附带的评论寄给父母，杂志在获得这些照片后会付给他报酬。其中有几张被屠杀的西藏人尸体的照片被刊出，泄露了“英国使团”并不是“和平使团”的秘密。贝利不得不解释与这些暴力行为的关系，他写信给母亲说非常不喜欢她将拍摄有死人的照片送给媒体²⁹。实际上，怀特、贝利、荣赫鹏等高级军官以及坎德勒、瓦德尔出版的游记、回忆录等所公布的照片极力避免暴露侵略过程中有关战斗、战场、尸体、俘虏等血腥和暴力的场景，大部分是关于西藏风光、地理、寺庙、人物以及英国人与西藏人友好交往的内容。他们的文字和摄影一起将侵略表述为“使团”如何揭开西藏尤其是拉萨神秘面纱的探险之旅，

27 扎洛：《西藏摄影：虚华的表象之后》，《中国摄影家》2007（6）：8。

28 英国政府、筹划者、亲历者都采取了隐匿真相、美化自身行为的描述方式，普遍把这次侵略称为“英国使团”（British Mission）、“荣赫鹏使团”（Younghusband Mission）或“荣赫鹏考察团”（Younghusband Expedition），规模庞大的侵略军则被描述成为“使团卫队”，迫不得已地情况下才会用一个遮遮掩掩的词——武装考察（armed expedition）。当代英国学者麦基已经指出“使团”是一个错误的名称，正确的名称应该是“英国对西藏的侵略”，参见 Alex McKay,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Tibet, 1903-1904." *Inner Asia* 14, 2012: 5-25.

29 Simeon Koole, "Photography as Event: Power, the Kodak Camera, and Territoriality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Tibet."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9, 2017: 338-39.

照片本身也被解读为纯粹的摄影艺术品³⁰。怀特的摄影于1905年在加尔各答出版，这套题为《西藏和拉萨》(*Tibet and Lhasa*)的两卷本摄影集，主要目的是作为送给当时的印度总督寇松的礼物，为1904年的侵藏提供官方辩护。怀特在书的前言中宣称：“正是西藏人的愚蠢的固执使派出英国使团极为必要”³¹，这些摄影想让公众认为，“英帝国对西藏的半殖民主义式的干涉是为了反对喇嘛教的桎梏。”普通士兵的西藏摄影则呈现出不同的视角，更能说明事情的真相，他们的照片有不少对战场上藏人尸体以及被破坏的西藏建筑的拍摄等。但是总体上，他们寄送给家庭、朋友的通信和照片则更显示了他们作为入侵者，“在西藏的一种高高在上的、娱乐化的心情”³²。这样的照片很少有机会公开，并在后来被有意无意地遗忘。

英国人西藏摄影的最初目的是记录入藏人员的活动和所见所闻，满足人们了解西藏的渴望。1910年代以后，英国人更为有意识地赋予摄影新的功能，即用来表达和实现英国的西藏政策，塑造有利于英国利益的西藏形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英国对藏政策目标的改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担任印度总督的寇松提出了“西藏缓冲区”的政策目标，手段上是试图直接的军事吞并，1904年的侵藏战争就代表了这种意图。由于英国国内对军事行动持有异议，直接吞并西藏也会带来巨大负担，随着寇松、荣赫鹏等相继去职，英国对藏政策进入调整阶段。1910年，中国因辛亥革命而来的动荡以及西藏的事变，为英国实施新的对藏政策提供了良机。英国放弃了直接吞并西藏的计划，转而采取间接将西藏扶植为保护印度的“缓冲区”政策。英国官方的西藏政策表述变为：“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前提是维持西藏的自治”。英国认为，西藏“维持自治于中国”的状态，对英印持友好政策，反对其他大国渗透，就能达到拱卫印度的目标，又不需要英国付出沉重经济和军事负担。该政策一直维持到1947年。

英国负责西藏事务的官员们首先意识到，要无中生有地创造一个所谓的“西藏缓冲区”，需要在观念和知识上做出努力。这包括通过文化和传播系统，渲染、鼓吹和制造“西藏独立”的形象；在国际关系中，要促进其他国家和民众对“西藏独立”身份的认可，至少是对西藏人拥有“自治权”的认可；此外，“将西藏描述为一片神秘和充

30 英国军官、士兵在1903-1904侵藏战争期间对西藏文物、财富进行了各种方式的劫掠，负责西藏事务的英印官员们具有看似矛盾而又“合情合理”的三重身份：他们既是负有帝国使命的政治官员，又是具备英帝国的道德情操和文明优越性的信念的绅士，还是通过和平或暴力方式收集、劫掠殖民地信息、艺术品和财富的强盗，参见 Michael Carrington, "Officers, Gentlemen and Thieves: The Looting of Monasteries during the 1903/4 Younghusband Mission to Tibet." *Modern Asian Studies* 37, 2003: 82.

31 Pamela Deuel Meyer and Kurt Meyer, *In the Shadow of the Himalayas*, 2005: 9.

32 Clare Harris, *Photography and Tibet*, 2016: 58-67.

满魔力的土地，可以彰显其分离于中国内地的独特性，因而也有利于英国在当时的利益。”³³ 1946年，已经退休的贝尔给印度事务部的唐纳森（E. P. Donaldson）的信中特别提醒说，“我们主要的政治目标之一就是展示西藏有自己的艺术等，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西藏与印度有比与中国更紧密的关系。”³⁴ 这实际上是贝尔等英印殖民地官员长期实施的文化政策。从这样的政治目标出发，英国人对西藏的文化表述完全不同于其惯常的“文化帝国主义”。他们不仅不想摧毁西藏人的“文化自尊心”，更没有意愿让西藏走向现代文明。其基本政策是尽量避免对西藏政治、社会和宗教制度的批评，赞扬、尊重这些制度，支持西藏人尤其是上层保持原有生活方式的愿望。这可以让他们感觉到英国的友好态度并能培育西藏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贝尔正是实施这种新的对藏政策的关键人物，他所确立的通过学术和非学术活动创造一个良好的西藏形象以配合实现对藏政治目标的策略，直到1947年都是英印殖民系统内部的基本共识。贝尔除了出版各类有关西藏的文字作品来塑造西藏的特殊形象，还“用图像来展示西藏的历史和文化，用以说明它们完全不同于中国。作为边境骨干官员、学者和作家，他利用摄影的力量来捍卫他所热爱的西藏的利益，以对抗强大的邻居对其东部的威胁”³⁵。后来的一些重要官员如威廉逊、古德、黎吉生等在处理西藏事务时都继承发展了贝尔将政治目标、学术研究与摄影艺术紧密结合的路线。

英国学者哈里斯直接把贝尔、古德、黎吉生为代表的英印殖民地官员在西藏的摄影活动称为“外交摄影”³⁶。所谓“外交摄影”，是指英国负责西藏事务的骨干官员们利用特殊的外交身份，借助入藏的便利条件，在西藏进行的有明确政治目的的摄影活动。外交摄影的目标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记录英国外交人员在藏活动；二是作为与藏人进行交往的手段；三是塑造和传播有利于英国殖民政策的西藏形象。英国人希望通过摄影向外界散播一种英国与中国西藏之间的特殊权力关系模式，即英印政府与西藏有着良好的外交与政治关系；英国代表们与西藏精英保持着经常和良好的接触，不论是“官方关系”还是私人关系都密切友好、欢畅融洽；只有英印政府的外交官才能自由地出入“神秘”“封闭”的西藏，可以轻易进入西藏的中心——拉萨。这种权力关系模式既是英帝国在喜马拉雅地区权力的体现，也是印度北部边境安全稳定的象征。负责西藏事务的英

33 Alex McKay,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Tibet, 1903-1904." *Inner Asia* 14, 2012: 22.

34 转引自 Alex McKay, *Tibet and the British Raj: the Frontier Cadre: 1904-1947*, Richmond: Curzon, 1997: 78.

35 Clare Harris, *Photography and Tibet*, 2016: 79.

36 参见 Clare Harris, "British and German Photography in Tibet in the 1930s." In *Tibet in 1938-1939: Photographs from the Ernst Schäfer Expedition*, ed. Isrun Engelhardt, Chicago: Serindia Publications, 2007: 80-82.

国高级官员与西藏最高层如达赖喇嘛、摄政等的合影就能较好地体现这种友好关系。贝尔身着戎装与流亡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在 1910 年的合影，就是展现他们的私人友谊和“官方友谊”的极为经典的视觉符号，因而反复出现在英国负责西藏事务官员的各类著作当中。再如，1936 年英国派古德使团到拉萨，英国官方的表述是为了继续维护和增强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友好关系。随行的查普曼的摄影，主要记录与西藏官员、贵族、活佛等的交谈、会晤、宴会等场面。他在《圣城拉萨》公布的照片集中于这些主题，“该书展示了关于拉萨上层的社会和家庭生活、新年游行和庆祝等的私密照片（intimate pictures）。”³⁷ 这些摄影让人感到，“拉萨是一个英印殖民政府的精英与具有相应级别的西藏贵族和宗教领袖们聚会的地方。”³⁸

贝尔、古德、黎吉生等的西藏摄影重点捕捉、呈现西藏的“与众不同”，直接作为西藏的“独立地位”的视觉证据。他们的摄影还集中于藏民族的生理学特征、服饰、发式、日常生活、建筑、文化活动等，具有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西方人一看到这些影像，立即就能将藏族这个具有鲜明生理和文化特征的民族与特定的政治边界联系在一起。贝尔在给英国官员或公众做报告时会大量展示自己的西藏摄影，“在那些场合，贝尔会指出藏传佛教文化和艺术极为独特、精美，值得英国保护，以免于汉人的侵蚀。”³⁹ 西藏在艺术、宗教、文化遗产等方面的“独特性”是英国的西藏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更容易通过摄影、电影、展览等视觉形式向西方公众呈现出来，进而影响其他国家。1944 年，古德在伦敦组织了西藏摄影展，吸引了英国新闻部、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的众多官员。印度事务部负责西藏事务的官员皮尔（R. Peel）直接对古德说：“让美国人看到这些西藏摄影会极有好处，这会让他们确信，西藏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⁴⁰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就西藏事务同英国进行了广泛交涉，而美国基本支持中国。对英国而言，美国的态度是个重大的影响因素，如果美国介入西藏事务并同情中国，那么英国的西藏政策将面临巨大挑战。因此，1943 年 12 月担任印度外交大臣的卡罗（Olaf K. Caroe）就提出：“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引导美国的观点。不管怎样，在这场战争中，希望美国国务院能最终决定：这并非英帝国主义的一场展示，而是美方可以诚实、适时地

37 E. H. C. W., "Reviewed Work: *Lhasa: The Holy City* by F. Spencer Chapman."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93, 1939: 260.

38 Clare Harris, "Seeing Lhasa: British Photographic and Filmic Engagement with Tibet 1936-1947." 2003: 10.

39 Clare Harris, *The Museum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2012: 78.

40 转引自 Peter H. Hansen, "Tibetan Horizon: Tibet and the Cinem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Imaging Tibet: Perceptions, Projections, and Fantasies*, eds. Thierry Dodin and Heinz R  ther,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 2001: 103.

支持我们寻求西藏自治的问题。”⁴¹“引导美国”是英国在撤出印度前最后几年极其重要的一项涉藏宣传目标，因此皮尔作为当时负责西藏事务的主要官员，一看到古德的西藏摄影自然立刻就能联想到它们在外交上的宣传价值。1946年初，西藏代表准备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大会，顺访印度。当时英国负责印度事务的国务大臣佩蒂克-劳伦斯勋爵（Pethick-Lawrence）指示外交事务大臣向印度政府传达在西藏事务上应该遵循的路线。他提出，“联系到使团对印度的访问，可能也要考虑对于西藏过去三十三年来地位的真实情况的宣传问题。这似乎为在国际媒体宣传西藏事实的国际地位提供了一个适宜的开端；当时机来临时，要特别注意提供全部的通讯便利，包括提供合适的背景材料，也要特别注意在这个国家（印度）和美国散播摄影形式的图片和电影。”⁴²同时，英国人也非常注意帮助美国记者或使团进入西藏，通过他们的大量摄影、纪录片、媒体文章等向美国民众传达一种英国人渴望塑造的西藏形象⁴³。

三、作为文化互动中介和情报手段的西藏摄影

对于负责西藏事务的官员和入藏使团专门安排的摄影人员而言，摄影、照片展示和电影放映等是与当地藏人进行文化互动的重要中介和交往的“润滑剂”，也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情报获取和传递方式。进入西藏的英国人主导了拍摄过程，在对藏民族的视觉化呈现中，英国拍摄者与藏民族之间是不对称的权力-文化关系，这一视角容易掩盖西藏人对摄影活动的认知和反应。西藏人在摄影活动中并非只是沉默被动的拍摄对象，不仅表现出对摄影技术本身的兴趣⁴⁴，而且对于英国人的摄影活动有积极的回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英国人拍摄的内容。西藏上层非常关注摄影中的自身形象，如果某些影像的

41 转引自阿拉斯泰尔·兰姆著，梁俊艳译：《中印涉藏关系史（1914-1950）——以英帝国外交史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361。

42 F 585/71/10, H. M. Government's Policy toward Tibet, January 11, 1946.

43 英国政府在20世纪40年代帮助美国的伊利亚·托尔斯泰（Ilya Tolstoy）和多兰（Brook Dolan）、托马斯（Lowell Thomas）、记者阿奇博尔德·斯蒂尔（Archibald T. Steele）等入藏，都有很强的政治宣传目的，希望借助入藏的美国旅行者向美国政府和公众传递关于英国的西藏政策、西藏的所谓“独立状态”等信息，关于这些美国人的入藏活动及英国在其中的角色，参见胡岩：《美国人眼中的旧西藏》，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9：85-176。

44 有几位西藏上层人物如德穆活佛、车仁晋美、擦绒·达桑占堆和他的儿子东堆朗杰都较早地在西藏进行了摄影活动，擦绒早在1920年就拥有了一台电影放映机并曾以电影招待到访的查理斯·贝尔，他和车仁晋美也都拥有电影摄影机，东堆朗杰还出版过自己的西藏摄影，参见Dundul Namgyal Tsarong, *What Tibet was: As Seen by a Native Photographer*, New Dehli: Pradeep Malhotra & Associates, 1990. 关于他们的摄影活动，参见索旁：《二十世纪初期的雪域摄影人》，《中国西藏》2005（1）：60-63。

内容有违西藏传统或者有损藏民族的“脸面”，西藏地方当局就会向西方人提出批评。1922年和1924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在贝尔帮助下获得西藏地方政府允许攀登珠峰，1924年还有两位英国运动员在珠峰遇难。英国珠穆朗玛协会（Everest Club）的摄影师诺伊尔（John Noel）参加了这两次登山活动并负责拍摄记录整个过程。他在1922年制作了无声纪录片《攀登珠穆朗玛峰》（*Climbing Mount Everest*），1924年又制成了《珠穆朗玛峰史诗》（*Epic of Everest*）⁴⁵。它们是典型的西藏人类学旅行纪录片，记录了登山队所经过地区的风景以及藏人的日常生活、寺庙活动等，展现了未能被英国登山队员征服的珠穆朗玛峰的纯洁与雄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藏人的“肮脏”和“怪异风俗”。

《珠穆朗玛峰史诗》记录了一个西藏男人给小孩捉虱子的场景，他把虱子直接放在嘴里咬碎，英国人解释虱子是西藏人的食物之一。1924年英国登山队未经允许还带了七名西藏人回英国，影院在放映纪录片的过程中，伴奏西藏音乐并由七名西藏人打扮成喇嘛表演羌姆，实际上其中只有一位是真正的喇嘛。他们还被带到伦敦动物园参观，他们与海豹、驼羊等合影的照片刊登在英国的报纸上。珠峰协会当时认为，这些活动表示了对西藏的神秘宗教和西藏人的尊敬，有助于消除人们对西藏浪漫、神秘的印象。但是在印度的一些西藏人以及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看过影片并了解到七位藏人在伦敦的表现后，向英国当局提出了严重的抗议。驻锡金政务官贝利警告电影制作者说，电影在印度放映时，吃虱子的画面招致了批评，西藏人认为这在西藏并不是典型现象，会给世界造成有关西藏的错误印象。西藏地方政府取消了所有英国在西藏的登山活动。1930年驻锡金政务官到拉萨时进一步报告说，十三世达赖喇嘛已经通过报纸看到了那些“跳舞的喇嘛”的照片，认为整件事是对他领导的宗教的亵渎⁴⁶。由于有“跳舞的喇嘛”事件的前车之鉴，之后进入西藏的英国官员们确立了一些基本的拍摄标准，小心翼翼地选择拍摄的方式、内容，更多地考虑西藏人的意见，在给西藏人展示照片、放映纪录片时会进行细致地选择和剪辑，保证内容能被接受⁴⁷。因此，摄影既反映了英国人的政治意图和审美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藏人所希望看到、愿意并且觉得有价值向拍摄者所展示的自身形象。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英国人的拍摄活动就越来越

45 英文当中的珠穆朗玛峰（Everest），音译为额菲尔士峰，英国在1858年以印度测量局局长乔治·额菲尔士（George Everest）的名字命名，带有殖民主义的色彩。自1952年起，中国政府就不再使用额菲尔士峰之称，代以藏族当地名称“珠穆朗玛峰”。

46 参见 Peter H. Hansen, "The Dancing Lamas of Everest: Cinema, Orientalism, and Anglo-Tibetan Relations in the 1920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3, 1996: 729-37.

47 Peter H. Hansen, "Tibetan Horizon: Tibet and the Cinem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2001: 91-92.

越受到这种双向互动的制约。

不时入藏的使团和在亚东、江孜、拉萨的英国机构，招待当地西藏客人的最重要活动之一是拍摄照片、录像，然后加以展示、放映。这极大满足了西藏人的好奇心，普遍受到欢迎，增加了英国人与藏人接触的机会尤其是拉近了与西藏上层及其家庭的关系。此外，通过放映一些西方影片或英国纪录片，英国人也向西藏人传递西方价值，展现英帝国的强大和繁荣。驻锡金政务官威廉逊在 1935 年入藏时就放映了记录英王乔治五世银婚庆典和亨顿航空展的英国宣传片。古德 1937 年的报告，特别强调了摄影和电影放映对于使团在拉萨开展活动起到的意想不到的效果。他认为：

西藏人觉得，几乎所有与电以及声音、图像和思想的传递相关的事情都同无线电和电影紧密相关。我们使团的无线电人员所展示出来的（无线电）的广泛用途产生了极佳的政治效果。摄影也是如此，电影摄影尤其（效果良好）。没有比什么在投影架或荧幕上看到自己或他们认识的人更让西藏人欢喜的事情了。（要我们）给家庭和寺院进行摄影的邀请络绎不绝，其中，僧侣们对于我们的电影拍摄最充满热情。一位高僧最近正式地建议，在拉萨安排放映关于缅甸、印度和锡兰佛教寺院的记录片，这会让拉萨人感到极为满足。⁴⁸

使团成员尼姆（Philip Neame）在日记中也提到：“饭前和饭后有一个电影放映时间，我们用 16 毫米放映机检查拍摄的录像并挑选出哪些适合于西藏观众。古德在肯尼亚拍摄的一些录像非常出色，对西藏客人们非常有吸引力。”⁴⁹ 英国代表或使团成员受邀参加西藏人的宴会或重要仪式时，主人们也会主动要求他们拍照和放映电影，正是在这样的摄影和欣赏摄影过程中，英国人与西藏上层之间确立了一种密切的社会文化互动关系。

摄影、电影放映等活动是获取西藏情报的有效途径，照片、影像逐渐演变为重要的情报内容。英国使团的驻地德吉林卡是进行这种摄影互动的重要场所，为英国人提供了与西藏精英建立友谊的极好机会。聚会、摄影和电影放映都是为此而设计的。对于西藏人而言，德吉林卡的魅力在于提供了一个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那些有权势和特权的西藏人能参加由英国人举行的聚会，也有了机会享受那些越过雪山来自外部世界的最新时尚和技术。英国人会通过摄影和文字形式记录下每一个西藏访客，每周报告给甘托克

48 F 3562/11/10, Report on Lhasa Mission, 1936-1937, by B. J. Gould, April 30, 1937.

49 F 7644/4/10, Diary of the British Mission to Lhasa, December 11, 1936.

的政务官，最终到达白金汉宫。它们一丝不苟地记录了客人的名字、提供的食物和娱乐活动。这些聚会也让英国人有机会收集到各种最新的流言蜚语，例如谁当今在拉萨得势或失宠，谁会来到或离开拉萨。”⁵⁰ 使团拍摄的照片与报告、日记、信件等一起通过英印邮政系统从西藏传递回印度和英国，成为印度外交和政治部、印度事务部等更高层次决策者们掌握使团活动细节、了解拉萨事态并做出相应指示的重要依据。1937年的古德使团成员尼姆就专门负责详细记录使团的活动日记，日记会被整齐排版打印，每周发送给印度外交和政治部以及伦敦的印度事务部、外交部等。这些日记还随附了几百张照片，涉及西藏风光、建筑、重要地点、拉萨的重要人物以及聚会、宴饮、正式会谈等场面。每页日记的文字内容都有相对应的一系列照片，每张照片有编号和说明，使团的活动和西藏的最新情况就直观生动地呈现出来⁵¹。

四、英国人西藏摄影传递的主要文化内容和审美倾向

英印的西藏骨干官员、西藏使团、商务代表、旅行者等实际上是一个很小的社会阶层。他们虽然有机会进入西藏甚至能较长时间停留在亚东、江孜甚至拉萨，但是接触的主要是高级官员、富裕商人、贵族家庭、寺庙领袖甚至达赖喇嘛等上层人物。这既带来观察西藏的便利，也使目光局限于极为狭窄的拉萨贵族圈以及布达拉宫、寺庙的宗教活动等。他们的西藏印象主要通过对大量聚会、宴饮、娱乐、拜会、参观等活动的描绘来体现。当事人一般对这些社交场面不吝笔墨，生动记述下每一个细节包括每一道菜的名称。查普曼的《圣城拉萨》专门有一章详实记述了受到重要人物招待的情景。他甚至把在一位噶伦家午宴的菜单记录下来，共十五道菜、三十几种食物的名称。他们被轮番宴请，古德因此做出了不得与四品以下人士进餐的决定。作为回敬，他们在德吉林卡一周之内安排了七次盛大宴会⁵²。摄影的内容主要也是西藏官方、上层、贵族家庭的生活场景以及与英国人的交往活动，再就是建筑、自然风光、寺庙的羌姆等。

由于受限于狭窄的交往圈子，出现在英国人摄影中的人物主要是与他们频繁打交道的西藏政治、宗教精英及其家庭成员。擦绒·达桑占堆就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常出

50 Tsering Shakya, "Cities and Thrones and Powers: The British and the Tibetans in Lhasa, 1936-1947." In *Seeing Lhasa: British Depictions of the Tibetan Capital 1936-1947*, 2003: 86.

51 这些附有大量照片的日记式情报报告，参见 FO 7575/4/10, *Diary of the British Mission to Lhasa*, December 8, 1936; F 7644/4/10, *Diary of the British Mission to Lhasa*, December 11, 1936.

52 斯潘塞·查普曼著，向红笏、凌小菲译：《圣城拉萨》，2006：8。

现在英国摄影中的人物之一，也是当时的英国报纸、流行刊物上常见的西藏人形象。擦绒的照片往往只会被标注为“一位身着庆典服装的官员”等，他的真实社会背景、政治活动以及在近代西藏历史中的作用被忽略，只是被当作整个藏民族的形象代表出现在英国公众印象当中⁵³。英国人受邀参加的宴会、仪式等只有西藏有身份地位的人才能办到，关于这些场景的文字描述和视觉图像洋溢着对所有西藏人物质丰富、精神愉悦、人际关系融洽、性情淳朴的感叹，阅读者自然认为这是整个西藏社会生活的缩影。这样的西藏形象显然是不完整的，西藏下层人的形象被刻意边缘化、隐匿化，普通的西藏人极少出现。总体上，英国负责西藏的官员们描绘了一副积极的西藏形象：“这包括对 1911 年之前中国人统治时期的糟糕状态的描绘，也包括对达赖喇嘛治理下状况改善的赞许。绝大部分的当时的英国作品都爱强调西藏农民的欢乐和满足，虽然肮脏但是脸上也永远带着微笑，在这样的话语中，奴隶制度也变成了极为温和的一种形式。”⁵⁴

英国入藏官员出版的著作都会配有照片、地图等。摄影可以直观呈现无法用语言文字描绘的自然风光、人物特征和旅行细节，让读者获得视觉上的身临其境之感，增强了作品的生动性和可读性。但是摄影的大量使用也带来了一种“表面性的阅读”（literal reading）⁵⁵，读者有时很难判断和理解相关作品中的照片是如何被选择和为何被选择的，而这恰恰是作者和出版商用心之处。照片并不是偶然和随机出现在游记中的某个位置，而是要体现作者曾经到过此处，见过此景，更重要地是与文字描述建立起逻辑上的联想关系。例如，很多英国人将西藏定位于“中世纪”时代，认为这里还保留着某些欧洲已经逝去的历史时光和景象，虽然显得陈旧，但是西藏的“中世纪优点”，也是欧洲人本应该保持却已经丧失的东西。查普曼就带着欧洲人普遍的怀旧心态感叹，西藏处在中世纪欧洲的状态——在很多方面也是现在反过来让我们羡慕的一种状态。《圣城拉萨》选用的照片也力图呈现西藏的“中世纪式氛围”，而文字本身提示读者要从“中世纪”视角欣赏照片。这些摄影还塑造了西藏风景的“雄伟壮观”，这是英国人所要体现的“西藏独特性”的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可以让人们在视觉上进而在观念上感觉到西藏明显区别于内地。

如前所述，随着 1910 年代英国对藏政策目标的改变，英国人“表述西藏”的风格

53 Clair Harris, "Seeing Lhasa: British Photographic and Filmic Engagement with Tibet 1936-1947." 2003: 8.

54 Alex McKay, "Wahrheit, Wahrnehmung und Politik: Die britische Konstruktion eines Bildes von Tibet." In *Mythos Tibet: Wahrnehmungen, Projektionen, Phantasien*, Hg. Thierry Dodin und Heinz Räther, Köln: DuMont, 1997: 74.

55 Peter Bishop, *Myth of Shangri-la: Tibet, Travel Writing and the Western Creation of Sacred Landscape*, London: Athlone, 1989: 4.

也开始发生显著变化。不论是对西藏的文字性描绘，还是影像作品，以及英国官方在公开场合对西藏的评价等都竭力避免提及西藏“让人不快”的方面。负责西藏事务的官员们在公开场合总是表现出对于西藏人的同情、尊敬、热爱和友谊，倾向于展现西藏的“积极形象”。这源于英国的一项基本政策，即尽量减少和避免对西藏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批评，即使某些官员对西藏有所批评，也不能将这些观点公开；要赞扬和尊重西藏的制度；肯定和支持西藏人“独特”的社会和宗教生活方式。贝尔阐述这种政策说：“在不时发生的事件中，我们应尽力把西藏人一方展示给公众，尤其是当许多错误陈述出现在中国、英国和印度的媒体上时。人们自然被灌输了这样的思想：西藏人富有侵略性并且是一个奴隶制的民族——尽管几乎所有已经发生的侵略和奴役都来自中国”⁵⁶。在政府内部讨论和制定西藏政策时，官员们可以畅所欲言，不必顾忌各种宣传策略。1944年1月17日，英国外交部的克拉克在内部报告中指出：

必须保证外藏永远不会成为未来中国行政体系的一部分；必须保证外藏能够永远控制自己的内部事务；必须保证中国军队永远不在外藏驻守防卫；必须保证永远不将外藏作为同不丹、锡金和尼泊尔进行直接交流的渠道。如果以上目标都能实现，那么，理论上外藏政府无论怎样独特都不重要。英国并不是来做慈善事业的，比如，以威斯敏斯特为模式制造一种民主体制，抑或在喜马拉雅北部进行社会改革。⁵⁷

因此，英国人根本就不在意西藏的社会制度本身到底是“进步”或“落后”，只要能保证西藏稳定可靠的“独立于中国”以及能起到拱卫印度的目标，英国人就会容忍西藏制度的任何“独特性”，英国并没有任何要给西藏人带来所谓的民主制度或社会改革的计划。相反，英国人认为，西藏内部政治社会制度的稳定、对外界的封闭等正是西藏保持为“可靠的缓冲区”的前提条件，通过赞扬和肯定这种制度，可以博取西藏上层的好感，维持良好的双边关系。因此，英国人摄影所选取的对象、拍摄的内容和角度等也有意遮蔽西藏“落后”的方面，突出西藏美好形象的倾向，这种倾向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强。

56 Charles Bell, *Tibet: Past and Present*, 1990: 268.

57 阿拉斯泰尔·兰姆著，梁俊艳译：《中印涉藏关系史（1914-1950）——以英帝国外交史为中心》，2017：354。

后来入藏的英国人追随这些拍摄西藏的方式，形成了一个“历史的世系”，使人们无意识的接受了殖民式的眼光，学会了用英帝国殖民精英群体的认知框架来认识西藏、观赏拉萨。长时间、高强度的拍摄西藏的活动刺激了英国本土大众的西藏想象并培育了人们对相似主题的更大需求。这在摄影者与消费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消费者被培养起来的认知标准和审美倾向反过来形成对摄影者和出版商的压力。为满足市场的审美需求，入藏旅行者会刻意寻找、拍摄一切能体现有关西藏的神秘、原始、中世纪形象的场景。因此，越到晚期英国的西藏摄影就越频繁地出现以下场景：原始的风光、宏伟壮观的布达拉宫、微笑着的藏人、神秘的宗教活动和习俗、沉浸于宗教信仰中的普通信众和僧侣、好客的藏人对他们的接待以及贵族们的宅邸、宴饮、聚会、庆典等。那些在视觉和想象上可能会给人带来“不悦”、有违这些审美情趣的场景和人物则越来越少。

英国有关西藏的摄影文化和审美品味的历史累积，最终使英国摄影塑造的西藏形象变成了事实与幻想的结合。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方主流文化开始赋予英国的西藏摄影一种崭新的记忆价值和审美情趣，即认为它们记录了西方人想象中的乌托邦空间——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在《消失的地平线》（*The Lost Horizon*）中创造的香格里拉⁵⁸。它们最重要的价值被认为是保存了一片幸福快乐、和平主义和精神性土地的美好景象，散发着中世纪的神秘气息，体现着一种世外桃源式的生活。它们被从“帝国档案”中抽取出来，通过新的纪录片、专题展览以及网络、数字化等方式继续发挥作用。人们更多从美学、艺术、怀旧的角度欣赏它们，而它们被创作时的政治、军事背景被不断遗忘。例如，2010年英国制成了一部名为《寻找香格里拉：1922-1950年间摄影中的西藏》（*The Search for Shangri-La: Tibet on Film 1922-1950*）的纪录片，主要利用了贝利、贝尔、古德、威廉逊、谢里夫等的西藏摄影。该纪录片除直接将1922-1950年间的西藏定义为香格里拉，还完全淡化、抽空了摄影者的政治身份，只将他们表述为摄影爱好者、人类学家、探险家等，强调他们到西藏只是为了寻找香格里拉这种纯粹的美学目的。这些摄影被当成了“一种凄美的见证和一个消失的世界（a lost

58 《消失的地平线》出版于1933年，是西方最早、最有影响的西藏题材小说，它不仅是长久不衰的畅销书，还被改编成各种版本的歌剧、电影、音乐剧等。希尔顿为英语世界创造了“Shangri-La”一词，在西方文化中几乎具有与“伊甸园”等同的社会文化含义，关于西藏的一种香格里拉式的心理想象和审美情趣已经广泛渗透到东西方电影、摄影、艺术、商业、政治、学术研究等方方面面。对西方人有关西藏的香格里拉想象的深入分析和反思，参见 Donald S. Lopez, *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eter Bishop, *The Myth of Shangri-La: Tibet, Travel Writing and the Western Creation of Sacred Landscape*; 沈卫荣：《寻找香格里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world) 的重要记录”⁵⁹。当代西方人充满了对旧西藏的神话式想象，西藏成为一个可以为身处后工业时代、面临诸多心理困境的西方人提供精神寄托的地方，他们能在这一“精神超市”中找到任何乌托邦梦想⁶⁰。英印殖民地官员的西藏摄影成为阐释、宣传旧西藏的所谓“遗世独立”特征的重要视觉载体，如同他们的文字作品等一样都被看作是一个所谓“前工业的、精神性的、单纯快乐的香格里拉”的证明。

结语

在近代西方与中国西藏的关系中，英国长期充当了主要的联系纽带的角色，英语作为世界范围内的“帝国式”语言，英国作家、旅行者、藏学家、殖民地官员的作品天然具有被广泛接触和阅读的优势。伦敦则是西藏知识的信息库和中转站，它还集殖民帝国的政治中心、知识文化中心和物质消费中心于一身，是新奇的文化事物、异类的审美情趣、各种新风尚的引领之地。入藏旅行者会被及时邀请到伦敦分享见闻经历，展示摄影、地图和艺术品，它们在伦敦能被欣赏、消费乃至成为文化焦点。正是借助科学文化和传播上的优势地位，承载着英国人政治隐喻、审美偏好的西藏影像资料深刻影响了整个西方的西藏认知和想象。英国的摄影集中于从甘托克到春丕谷再到江孜、日喀则直至拉萨的道路沿线，记录了丰富多彩的西藏风貌。它们涉及到山川形制、自然风景、人物、寺庙建筑、节日庆典、公务活动，以及西藏上层家庭的日常生活、服饰、家居等，对于研究二十世纪前半期的西藏尤其是拉萨具有珍贵的视觉人类学的价值。没有这些摄影，我们无法直观生动地了解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穿着打扮、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动场景，也无法精确还原一些城市、寺庙、建筑的风貌格局。但是，这些记录又是偶然的场景、时刻和人物，呈现的是极为有限的空间。这些摄影是特殊的人类学、政治学意图的产物，承载着摄影者的文化、政治隐喻，既传递了一些真实信息，又使西方人对西藏产生了幻想。历史上的摄影很大程度上又都是“当代摄影”，欣赏者总是通过自身时代的价值标准、审美情趣、心灵渴望和对摄影对象的认知偏好来解读它们，甚至为了特定的利益诉求而赋予它们新的视觉意义。当代一些西方人、机构和一部分流亡藏人都在努力利用这些视觉资料来重新表述西藏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突出它们蕴含的香格里拉的美学特征。我们应该对这些早期英国人的西藏摄影进行细致的历史学、视觉

59 <https://www.independentcinemaoffice.org.uk/films/the-search-for-shangri-la/>

60 Martin Brauen, *Traumwelt Tibet - Westliche Trugbilder*, Zurich: Haupt, 2000: 228.

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揭示它们被生产出来时的特定历史和政治背景及其在当代西方的新的美学内涵，以利于我们更好使用和解读它们。

◆ 赵光锐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张植荣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ABSTRACTS

"The Yak Mirror" and the Study of "Tibetan Handled Mirrors"

Li Yongxian

(Tibet University; Sichuan University)

Starting with the recent appearance of the "Yak Mirror" in Tibe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four handled copper mirrors found in the Yarlung Tsangpo River basin, including the "Qugong Mirror" in Lhasa. It is believed that these copper mirrors are early indigenous Tibetan bronze artifacts, influenced by the "Northern Grassland Culture" in terms of their design. Their metallurgical and casting techniques, as well as their mirror-and-handle assembly method,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uthwestern Aborigines Bronze Technology System" in the eastern plateau. They differ in technical origin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from the handled copper mirrors unearthed in the Langchen River basin in western Tibet. These mirrors hold significant regional importance for Tibet's "Early Metal Age."

Early Use and Smelting Technologies of Iron in the Ngari Region of Tibet: A Scientific Analysis of the Iron Smelting related Remains Excavated from the Kaji Cemetery Site

LiYuniu¹ Sun Tianqiang¹ Zhang Mengyi² Li Shuai¹ Yang Feng¹

(1.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Sichuan University

2.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Northwest Univers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 of the early use and smelting technology of iron in the Ngari region of Tibe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ron objects and slags that were excavated from the Kaji cemetery at Piyang-dongga village in Tsada county. The results of metallographic and elemental studies provide the first and earliest evidence of bloomery smelting technology in Tibet as early as the third century AD. The iron smelting technology and the excavated iron objects possibly belong to the "northwest system" and are probabl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sperity of the Plateau Silk Road.

Re-investigations of the Two Gtsang-Grong Steles in Drachee (Grwa phyi) of Central Tibet

Shawo Khacham

(Tibet University)

Gtsang-Grong steles are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ibetan history and the belief system of the early Phyi dar period. Although scholars have already studied these two steles, their basic results were not complete. Based on multiple on-site investigations, this paper combines historical records with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reviews previous studies,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wo steles, and proofreads all the inscriptions. The inscriptions reflect the revival of Buddhist teaching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hyi dar period, and the joint management of the monastery by monastic and lay communities. From the grammatical features of the inscriptions and the events recorded on the steles, the author suggests the two steles were erected during the early 11th century. Influence from India and Central China can also be determined from the craftsmanship of the steles.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a Newly Discovered Manuscript of the *Historic Iron Credential Document of Tubo* from Western Tibet

Ngakon and Sonam Tsetan

(Editorial Office of Journal of Tibet University; School of Humanities at Tibet University)

Recently, a "folk copy" of the so-called Historic Iron Credential Document of Tubo was found in Ngari, Western Tibet. The contents of the manuscript pertain to the decree granted by the Tsanpo Khri Srong lde btsan to his minister Rgye shin Khri dbang gtsug pud rje la khwe, and the subsequent inheritance of the imperial edict within the family. Although the imperial decree mentions historical figures like Mes Khri Sta'u snya gzigs, Khri Gnam ri srong btsan, Srong btsan gsam po and Khri srong lde btsan, along with their related activities, these events are not found in other historical records, making speculative interpretations unwise. In order to benefi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transcription and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manuscript, aiming to serve as supplementary research material for the history of Tubo period.

A Re-examination of the Gansu Section of the "Tang-Bod Ancient Route"

Li Zhipeng

(Shannxi Normal University)

The "Tang-Bod Ancient Route" served a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ang and Tubo. Due to the scarcity of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and the ambiguity of historical records, there has been limited in-depth exploration in the academic field regarding the routes and historical impact of the Gansu section of the "Tang-Bod Ancient Route". This paper approaches the subject through the lense of documentary sources, cultural relics, folklore, and more, focusing on political interactions, economic exchanges, and cultural blending along the Gansu section of the "Tang-Bod Ancient Route". It also discusses the roa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Tea-Horse Ancient Road and the Plateau Silk Road to provide a more objective overview of the routes and the cultural exchanges that occurred along the Gansu section of the "Tang-Bod Ancient Route".

Review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the Qinghai Route of the Silk Road

Cao Zhongjun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re for Archaeology of the Silk Roads,
Northwest University)

The Qinghai Route of the Silk Road i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the eastern section of the Silk Road, and research in this field has spanned over eighty years. Looking at the existing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the main focus has been on case studies of historical events and relics related to the road, but fail to comprehensively sort out the relevant content within a unified framework. Most of them appear to be self-contained and lack integration.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provide a concise review and commentary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findings. This includes research on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the Qinghai Route of the Silk Road, exploration and study of the road network,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research along the route, and studies of the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habiting the Qinghai Route. With the continuous emergence of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ethnic theories, it is imperative to rethink and reevaluate the significance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reflected in the Qinghai Route. In future research,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inity" of the Qinghai Route, explore new research approaches that combine ethnic groups and the route, and seamlessly integrate the study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with the study of route changes. This will contribute to a deeper and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Silk Road's Qinghai Route.

A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Baza Bridge in Lanzhou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hi Jianju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In the summer of the third year of the Yuanfu 元符 era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Song army abandoned Shanzhou 鄯州, retreated to Huangzhou 湟州, and repaired the Anxiang 安乡 Bridge in Hezhou 河州 and the Baza 把搦 Bridge in Lanzhou to facilitate support for Huangzhou. The Baza Bridge got its name from the crossing of the Yellow River at the Baza Ferry. It guarded two fortresses on both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ides of the Yellow River, which were later named Jingyu Pass 京玉关. The bridge was formerly known as the "ancient floating bridge" at the stream outlet Zhuolong 斫龙 and the "Guangwu Bridge" in Guangwu 广武 County of Lanzhou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Jingyu Pass consisted of two city gates, the southern and the northern city. The southern city was divided into an old city and a new city. The old city was Yijitan Old Fortress 益机滩旧堡, which was built in the summer of the third year of the Yuanfu era and was destroyed by an earthquake in the leap-month of March of the sixth year

of the Xuanhe 宣和 era. The new town was called Yiji Fortress, which was built in the sixth year of the Xuanhe era and was later renamed Anqiang 安羌 City in August of the same year. Baza bridge is situated 40 km west of Lanzhou and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in controlling and guarding the routes leading west from Lanzhou to Miaochuan 邈川 City (Huangzhou), northeast from Miaochuan City to Zhuolong City, and northwest from Lanzhou to Liangzhou. It serves as a crucial inflection point for the study of traffic between the Tang and Tubo,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Northern Song, Xixia, and Qingtang in Tibet.

An Examination of the Source of the Thangka of Milarepa's Life: Based on the Collection at the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Liang Yunyun

(School of Art at Sichuan University)

The thangka depicting Milarepa's life, housed at the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is currently known as one of the earliest thangkas of its kind. The author interprets the painted scenes in thirty sections and their inscriptions based on the biography of Milarepa, the *Rje btsun chen po mi la ras pa'i rnam thar thar pa dang thams cad mkhyen pa'i lam ston*, that was compiled by Gtsang smyon Heruka (1452-1507), alias Rus pa'i rgyal mtshan in 1488.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content of this biographical thangka of Milarepa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biography. The thangka illustrates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Bri gung bka' brgyud lineage from Milarepa, tracing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spiritual legacy back to Milarepa's practice site at La phyi. This type of thangka was firstly created by Gtsang smyon Heruka and his disciples who incorporated elements from traditional Tibetan Buddhist narratives into its composi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thangka was to promote the newly emerging biography and songs of Milarepa.

A Thangka Set of Śākyamuni and the Sixteen Arhat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Lijiang Municipal Museum

Li Kai

(Sichu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The Lijiang Municipal Museum owns an old collection of seventeen Thangka Paintings depicting Śākyamuni Buddha, his two disciples and the Sixteen Arhats. These paintings exhibit a distinctive style, combining elements of both Han and Tibetan culture. They stand out with their rich Han-style influences

and a unique portrayal of birds, animals, and scenes of feasting. By comparing these Thangkas with another set of seven thangkas from the same museum's old collection featuring Tibetan inscriptions,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is set of seventeen Thangka Paintings likely originated from the tenth Karmapa Chos dbyings rdo rje (1604-1674), a famous Tibetan artist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hese two sets of Thangkas of Arhats represent a unique style known as "Han-style Thangkas" and serve as remarkable examples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 that took place between Han and Tibetan cultures over an extended period, with broad, multifaceted, and deep interactions.

Basic Demonstratives nə^{53} and tə^{31} in the Pada Tibetan

Song Xiaoh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t Nankai University)

The basic demonstrative system in the Pada (Dba' sde) Tibetan language consists of nə^{53} and tə^{31} . They are used as argument independently, and can also modify nouns in noun phrases. These two demonstratives may precede, follow or be juxtaposed to a noun within a noun phrase. Juxtaposition is typologically rare. Different demonstrative and noun orders have different deictic functions and referential meanings. Postposition is the dominant order in Written Tibetan. tə^{31} in postposition conveys definite meaning which is induced by pragmatic function. Preposition conveys distance and it is the result of grammatical system and language contact.

The French Missionaries' Regional Knowledge of Khams in the Mid-19th Century

Luo Hong and Liu Xiaoxu

(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 of Sichuan University;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Nanfang College, Guangzhou)

In the mid-19th century, the propagation of Catholicism by the French Catholic missions in the Khams area entered a prolonged period of exclusive influence. As a vital bridging area connecting Tibet and the interior of China, Khams was a crucial passage for French missionaries on their journey into Tibet. Notable figures like Evariste Huc of the Lazarists, Jacques Léonard Pérocheau and Charles René Alexis Renou of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 discussed and document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Khams area in their correspondence and travel diaries. Some of these missionaries, such as Huc, Renou,

and others, had firsthand experience of the Khams area and provided detailed records about the local transportation. Influenced by early European perceptions of Tibet, their discussions and records often contained subjective elements and deviated significantly from historical facts. These misconception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Western perceptions and cast shadows over subsequent issues related to the delineation of Sichuan and Tibet.

A Histo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Boundary Demarcation of the Sichuan-Tibet Missionary Region by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 in the Mid-19th Century

Liu Ruiyun and Fan Changlong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at Sichuan University)

In order to exert religious and cultural influence on Tibet, the Vatican established the Apostolic Vicariate of Lhasa in 1846, and sent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 of Tibet to preach there. However, out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infiltration of western religious culture, bo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local authorities in Tibet strictly prohibited foreign missionaries from entering Tibet without permission. As a result, the Society's activities in the region were severely hampered, and it had to turn to the Sichuan Missionary Society to "borrow land" in order to gain a foothold. In 1858, Bishop Desmazes of the Apostolic Vicariate of Lhasa, Bishop Desflèches of Southeastern Sichuan, and Bishop Pérocheau of Northwestern Sichuan met with the diocesan circles of Sichuan and Tibet to expand the scope of the Society's missionary activities from Tibet into Sichuan Province. This meeting between the ecclesiastical circles of Sichuan and Tibet resulted from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s inability to enter Tibet. It also reflects the differences and disputes between the radical and conservative factions within the church regarding the expansion of missionary activities in China. Finally, it also shows that at that time both the Qing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Tibetan government strictly prohibited European missionaries from entering Tibet and spreading Catholic religious culture.

Recording Tibet: British Photography in Tibe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Zhao Guangrui and Zhang Zhir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Nanj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Beijing Universit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British dominated the field of using images to document Tibet. The Western world's visual impression of Tibet was largely controlled by the British, especially by the border officials of the British Raj. Photography served as a cultural and artistic activity, a means of social interaction, an important intelligence-gathering tool, and an effective visual medium for shaping the image of Tibet that was conducive to British interests. British diplomatic photography in Tibet concealed the power dynamics the British and Indian colonial governments hoped to convey in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ibet. It reflected the frequent contact between British representatives and Tibetan elites. These photographs could also portray Tibet as "distinct" in terms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British Tibetan photography was constantly re-selected and re-interpreted by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under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texts. Some were deliberately highlighted, while others were deliberately downplayed or forgotten.